

长江流域青铜乐器的传承与演化

戴鹏飞

西华大学, 四川 成都 611730

DOI:10.61369/EDTR.2025050025

摘 要： 长江流域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楚、巴、蜀等国都有青铜乐器的发现。本文以长江流域出土和传世的青铜乐器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分析其传承与演化的特点。研究发现，长江流域青铜乐器受到中原地区青铜乐器的深刻影响，但又形成了区别于中原的独特风格；巴蜀地区青铜乐器与楚地关系密切，彼此交流与融合，共同推动了长江流域青铜乐器的发展；不同时期长江流域青铜乐器在形制、纹饰、乐律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总之，长江流域青铜乐器在传承中国传统乐器制造技艺的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风貌。

关 键 词： 长江流域；青铜乐器；传承；演化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Bronze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Dai Pengfei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730

Abstract：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birthplaces of Chinese bronze civilization. Bronze Musical Instruments were found in Chu, Ba and Shu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pre-Qin period. This paper takes the bronze Musical Instruments unearthed and handed down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ir development context. It is found that the bronze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bronze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he Central Plains, but they also form a unique styl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he bronze Musical Instruments in Bashu region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Chu region, and their exchanges and fusion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bronze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Bronze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n different periods show obvious stage characteristics in shape, pattern, rhythm and so on. In short, the bronze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not only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 manufacturing skills, but also reflect the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imes.

Keywords： Yangtze river basin; bronze musical instruments; inheritance; evolution

引言

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涌现出楚、巴、蜀等青铜文化。大量考古发现表明，青铜乐器制造是这些古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湖北出土和传世的楚式编钟最为著名，从西周晚期至战国，编钟形制不断改进，数量持续增加，反映了楚国青铜乐器铸造水平的精进^[1]。四川、重庆一带出土的巴蜀青铜乐器虽然数量不及楚地，但从春秋晚期到战国，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巴蜀特色青铜乐器如虎钮鐻于，更是独树一帜。这些古乐器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信息，为我们认识长江流域先秦音乐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巴渝民间艺术研究中心2024年青年项目，巴渝地区青铜乐器鐻于的多元价值研究，项目编号：BYMY24C07。

作者简介：戴鹏飞（1990.12-），男，汉族，四川南充人，博士，西华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教育学。

一、长江流域青铜乐器概述

（一）长江流域青铜乐器的考古发现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长江流域先后出土了大量青铜乐器。据统计，湖北出土和传世的编钟达100余件，铜鼓30余面，此外还有少量的鐃于、铙等打击乐器。四川、重庆出土和传世的青铜乐器以虎钮鐃于最为引人注目，数量在80件左右，此外还有扁钟、铜铎等。这些乐器器形别致，纹饰精美，为研究长江流域先秦音乐文化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二）长江流域青铜乐器的类型

长江流域青铜乐器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 编钟：由多件大小不等的钟组成，悬挂在一个木架上，铜质，发音清亮嘹亮，是典型的楚式打击乐器。
2. 铜鼓：鼓面铸有太阳纹，鼓身饰兽面纹，铜质，声音低沉浑厚，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特有的青铜打击乐器。
3. 鐃于：形似敲钟，上部有一圆形钮，共鸣腔呈椭圆形或圆锥形，多为虎钮，少数为兽面钮，主要流行于巴蜀地区。
4. 钟磬：早期多为甬钟，后发展为钮钟，单独悬挂，敲击发声。蜀地出土较多，形制略有不同。

其他：还有少量的扁钟、铙等青铜乐器零星出土于长江流域不同遗址。

二、长江流域青铜乐器的发展脉络

（一）萌芽阶段：西周至春秋早期

西周晚期，随着青铜冶铸业的进步，长江流域开始出现青铜乐器。这一时期的代表是出土于湖北曾侯乙编钟^[2]。它由19件大小不同的钟构成，分别悬挂于两个木架上，音域宽广，基本奠定了后世编钟的形制。但总体上看，这一阶段长江流域青铜乐器的数量还比较少，工艺也有待提高。

（二）成熟阶段：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

进入春秋中晚期，随着诸侯争霸的深入，青铜乐器制造迎来了全盛时期。以曾国为代表的诸侯国竞相铸造编钟，曾国王墓出土的33件编钟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这套编钟钟体修长，钟口方中带圆，音色优美动听，体现了曾国青铜乐器制造的高超水平^[3]。巴蜀地区虽未发现春秋时期编钟，但出土了不少甬钟，质地较好，纹饰独特，反映巴蜀青铜文化已进入成熟阶段。

（三）繁荣阶段：战国中晚期

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青铜乐器制造进入繁荣时期。这一时期，楚式编钟更为成熟，如曾侯乙编钟，其形制已十分规范，装饰华丽，共有65件之多，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编钟制造的最高水平。巴蜀地区虎钮鐃于独树一帜，虎钮形态生动传神，盘面纹饰绚丽多彩，充分体现了巴蜀青铜文化的地域特色。此外，战国时期长江流域还出现了多种青铜打击乐器，如大型鼓座、铙等，形态各异，纹饰丰富，与编钟等乐器组合演奏，必定效果宏大。

三、长江流域青铜乐器的传承与交流

（一）受中原青铜乐器的深刻影响

中原地区是中国青铜文化的核心区域，其青铜乐器铸造技艺和礼乐制度对长江流域产生了深远影响^[4]。考古资料显示，长江流域出土的青铜乐器在制作工艺上继承了中原的传统。例如，最

早出现在中原的失蜡法铸造工艺，成为楚地编钟制作的主要方法；源自中原的泥范法，在鄂西地区的青铜鼓铸造中得到广泛应用。可以说，中原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为长江流域青铜乐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此外，自西周开始，受“礼乐治国”思想的影响，周王室多次将钟磬等乐器赐予长江流域的诸侯国。据记载，西周康王曾将钟磬赐予荆蛮；春秋时期，楚国也多次获赠中原乐器。这种官方的文化交流，使得中原乐器及其背后的礼乐文化不断向南传播。随着郢都等地成为南方政治文化中心，中原礼乐在楚地日益盛行，楚式编钟等乐器也渐渐呈现出浓郁的“周风”。而在更南部的巴蜀地区，其青铜乐器虽保留了不少地方特色，但从总体风格看，也难掩中原乐器的影子^[5]。

（二）巴蜀与楚地青铜乐器的交流融合

巴蜀与楚地不仅同根同源，而且在青铜乐器的制作与文化内涵上也有许多共通之处。两地虽然分属不同的政治势力，但在冶金、铸造等技术领域却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战国时期，随着巴蜀古国的兴起，其青铜文明也进入了鼎盛阶段。考古发现，这一时期巴蜀地区青铜器制作水平显著提高，出现了大量精美的青铜乐器。比如四川出土的战国编钟，从钟体的形态到表面的纹饰，都与同时期的楚式编钟极为相似。这些编钟往往呈长方形，钟壁略呈弧形，饰有错金银的精美图案，整体设计古朴优雅，彰显出与楚地乐器相通的审美情趣。又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铃，虽然年代较早，但从其别致的造型和细腻的花纹上，已经能够看出与楚文化的某种关联。这些发现表明，早在商周时期，巴蜀就已经开始吸收楚地先进的青铜器铸造技术。

事实上，作为长江流域的两大古国，巴蜀与楚地在青铜器制造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互动。一方面，楚国凭借其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技术，向南传播了成熟的铸造工艺，为巴蜀青铜器的升级换代提供了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巴蜀地区凭借其特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底蕴，也向北输出了不少独具特色的器物样式，丰富了楚式青铜器的内涵^[6]。比如巴蜀地区盛行的虎钮、兽面纹等装饰元素，就逐渐被楚人吸收，运用到编钟等乐器的设计中。

可以说，巴蜀与楚地在青铜乐器制作领域的频繁交流，是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种跨越政治藩篱的文化互鉴，不仅促进了冶金铸造等实用技术的进步，也推动了不同地域审美趣味的交融，最终形成了长江流域青铜乐器独特而多元的文化景观。

四、长江流域青铜乐器的阶段性特征

（一）西周至春秋早期：形制初具雏形

从目前考古发现看，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是长江流域青铜乐器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最早的编钟，如曾侯乙编钟，它奠定了后世编钟“自大钟至小钟，由粗至细，由长变短”的基本形制。但这一时期编钟体量偏小，数量有限，纹饰相对简单，反映当时青铜乐器制造还处于起步阶段^[7]。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编钟多为单件或少数几件组合使用，尚未形成完整的乐器组合系统。从冶铸工艺来看，早期长江流域青铜乐器主要采用块范法和泥范法铸造，技术相对简单，导致乐器音质不够纯净，音色

较为浑浊。此外，装饰元素多借鉴中原地区的传统纹样，如夔龙纹、雷纹等，本土化特征不明显。如在湖北随州地区出土的西周晚期钟形器，虽已具备钟的基本轮廓，但钟壁厚薄不均，音域狭窄，敲击后余音短促，表明当时制钟技术尚不成熟。这些早期青铜乐器的使用主要限于贵族祭祀活动，并未广泛应用于日常礼乐场合，显示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有限功能。

（二）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制作工艺精进

春秋中晚期，随着青铜冶铸技术的进步，长江流域青铜乐器的制作工艺明显精进。首先，乐器形制更加规范。如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14件编钟，大小依次排列，钟体修长挺拔，分列于两架，结构严谨^[6]。其次，乐器装饰更加丰富。如信阳长台关二号墓出土的19件编钟，钟面饰蟠龙纹、云雷纹、兽面纹等，错金错银，华丽典雅。这些都体现了这一时期青铜乐器制造水平的提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青铜乐器的铸造技术出现了重大突破，失蜡法开始在楚地普遍应用，使得钟体更加精致细腻，音准更为准确。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编钟，采用分铸分范技术，钟壁厚薄均匀，敲击发音清脆悦耳，余音绵长，展示了楚地冶金技术的卓越水平。此外，这一时期乐器制作开始注重音律的协调，如蔡侯墓出土的编钟已能演奏完整的五声音阶，音色纯净和谐。在使用方面，编钟与编磬开始配套使用，形成了“金声玉振”的理想音响效果。

（三）战国中晚期：巴蜀特色乐器兴起

到了战国时期，长江流域青铜乐器的种类更加丰富，地域特色更加鲜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巴蜀地区兴起的虎钮鐻于。如重庆涪陵小田溪二号墓出土的一件虎钮鐻于，钮作伏虎状，虎首高昂，口大张，鼻眼清晰，栩栩如生^[9]。这一时期，随着巴蜀地区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当地青铜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考古发现表明，战国晚期巴蜀地区已形成了完整的青铜乐器制作体系，不仅能生产虎钮鐻于，还能制作各类铜钟、铜钲等特色乐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战国晚期铜铃，造型优美，音色清亮，是巴蜀乐器的又一代表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乐器不仅用于宗教祭祀，还广泛应用于军事和民间娱乐活动。如《华阳国志》记载，巴人“好祠鬼神，尚巫祝，信祭祀”，青铜乐器在各类祭祀场合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材质上看，巴蜀地区铸造的乐器多采用高锡青铜，硬度适中，音色通透。在制作工艺上，巴蜀工匠

偏好采用整体浇铸法，确保乐器结构稳固^[10]。此外，虎、豹等动物形象在乐器装饰中大量出现，反映了巴蜀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以及其独特的审美情趣。

（四）乐律、音色的独特之处

长江流域青铜乐器在乐律、音色方面也有自身的特点。以楚式编钟为例，据测定，曾侯乙编钟的五声音阶为宫、商、角、徵、羽，接近于现代的五度相生律，基本符合传统的十二律吕。但也有学者认为，曾侯乙编钟的实际音高与现代乐音有一定出入，可看作是古代乐律的体现。此外，在编钟的配器上，长江流域也有区别于中原的做法。如一些墓葬出土的编钟数量虽多，但往往只有几件能发音，其余钟只起装饰作用，这在中原乐器中较为少见，反映了南方青铜乐器的独特审美取向。通过声学测量发现，长江流域青铜乐器普遍具有“一钟双音”的特性，即同一口钟可在不同位置敲击产生两个不同的音高，这种独特设计大大拓展了乐器的表现力。湖北随州出土的战国中期编钟，经测试可产生五个八度的宽广音域，远超同时期的中原乐器。从音色特点看，楚式编钟音色明亮圆润，泛音丰富；巴蜀虎钮鐻于则音色低沉浑厚，余音悠长。这些声学特性与乐器的形制、材质密切相关。研究表明，长江流域青铜乐器多采用含锡量在15% ~ 20%之间的青铜合金，这种配比使得乐器既有足够的硬度保证音质，又不至于过于脆弱。

五、结语

综上所述，长江流域是我国先秦时期重要的青铜乐器产地。从西周晚期至战国，随着青铜冶铸业的发展，长江流域出现了大量制作精美的打击乐器，其中尤以楚式编钟和巴蜀虎钮鐻于最为著名。一方面，长江流域青铜乐器制造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体现出与中原乐器的某种一致性；另一方面，巴蜀与楚地在青铜乐器领域频繁交流，相互促进，形成了区别于中原的独特风格。通过分析长江流域青铜乐器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我们既看到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发展脉络，又感受到南方地域文化的异彩纷呈。这些古老的乐器不仅见证了长江流域先民的智慧，也为后世乐器的制造和演奏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李晓莉, 罗新泽. 我国早期青铜乐器的传承与发展 [J]. 大观 (论坛), 2025, (01): 3-5.
[2] 何可. 江苏地区出土青铜乐器铭文整理研究 [J]. 东方收藏, 2024, (11): 33-35.
[3] 谭凯文. 以巴文化青铜乐器为中心的巴国古乐史研究 [D]. 海南大学, 2023.
[4] 靳健. 西周青铜器生产体系研究 [D]. 山西大学, 2022.
[5] 张莉. 虎钮鐻于的文化空间变迁研究 [D]. 湖北民族大学, 2022.
[6] 孙宝山. 青铜乐器青铜铸造工艺的最大考验 [J]. 艺术品鉴, 2021, (19): 48-49.
[7] 陈占欣. 东周时期楚国青铜器动物纹样探讨 [J]. 收藏与投资, 2024, 15(12): 41-43.
[8] 舒清运. 对称视角下的商周青铜器 [J]. 中国拍卖, 2024, (09): 62-68.
[9] 宋新新. 商周时期青铜器纹饰在装饰设计中的研究启示 [J]. 西部文艺研究, 2024, (05): 103-109.
[10] 郑艳. 晋东南地区商周青铜器概述 [J]. 收藏与投资, 2024, 15(08): 25-27.